

# 最終研究報告：普遍基本收入(UBI)全球試驗成效評估：經濟影響、社會福利變革及實施挑戰

## 執行摘要

本報告旨在對全球範圍內的普遍基本收入 ( 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 試驗進行全面評估，深入分析其在經濟影響、社會福利變革及實施挑戰方面的成效。研究涵蓋芬蘭、加拿大安大略省、肯亞 GiveDirectly、美國斯托克頓市和德國Mein Grundeinkommen等代表性案例，並探討了其他地區的探索。

研究發現，UBI試驗普遍在改善參與者心理健康、減輕財務壓力、提升生活滿意度和社會參與度方面展現出顯著的潛力。對於就業率的影響，多數試驗結果駁斥了UBI會導致大規模勞動意願下降的擔憂，部分案例甚至顯示其促進了更高質量就業或創業。UBI資金主要被用於基本必需品，而非濫用。然而，報告也警示了大規模推行UBI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包括龐大的財政可持續性問題、潛在的宏觀經濟影響 ( 如通脹壓力 )、與現有福利體系的複雜整合，以及政治可行性和公眾接受度的障礙。

最終報告將為政策制定者、學術界及公眾提供一個多面向的參考框架，以更全面地理解UBI的潛力與局限性，為未來的政策討論和決策提供實證基礎與審慎建議。

## 1. 引言與研究背景

### 1.1 普遍基本收入(UBI)的定義、歷史沿革與理論基礎

普遍基本收入 ( UBI ) 是一種社會福利模式，其核心特徵是政府無條件地定期向每個公民支付一筆固定的生活費用，不論其收入、財富或就業狀況。這種支付具有普遍性 ( 面向所有公民 )、無條件性 ( 不設資格審查 )、定期性 ( 按月或其他頻率發放 )，且通常設計為足以滿足基本生活所需。

UBI的思想源遠流長，可追溯至16世紀托馬斯·摩爾《烏托邦》中對無條件收入的構想。18世紀，托馬斯·潘恩在《土地正義》中提出通過對土地徵稅來為所有人提供基本收入。19世紀約翰·斯圖爾特·密爾也曾討論類似的「社會分紅」概念。20世紀，隨著工業化進程和福利國家理論的發展，UBI概念再次受到關注，馬丁·路德·金等民權運動領袖亦曾倡導。進入21世紀，伴隨自動化、人工智慧對勞動市場的潛在衝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零工經濟的興起以及對現有福利制度效率的質疑，UBI再次成為全球政策討論的焦點。

UBI的理論基礎多元，包括：**社會正義** ( 確保所有公民享有基本生存權利，減少貧困與不平等 )、**經濟效率** ( 簡化現有複雜福利制度，降低行政成本，並可能刺激經濟 )、**應對技術變革** ( 為因自動化失業的勞動者提供安全網，支持其轉型 )、**個人自由與自主性** ( 賦予個體更多選擇權利，如追求教育、創業、照顧家庭或從事無償勞動 )、以及**公民紅利** ( 主張所有公民應分享社會共有資源，如自然資源、知識產權等所產生的收益 )。「基本生活所需」的衡量標準因地而異，通常可參照當地貧困線、最低工資水平的百分比或特定消費籃子。

### 1.2 全球範圍內對 UBI 試驗日益增長的興趣與動機

近年來，全球對UBI試驗的興趣顯著增加，主要動機根植於當前多重社會經濟挑戰。包括日趨嚴重的貧富差距、全球化與零工經濟帶來的勞動市場結構性變化、自動化與人工智慧對傳統就業的潛在顛覆性

衝擊，以及對現有社會福利制度複雜性、效率低下和覆蓋不足的普遍質疑。許多國家和地區希望透過 UBI 試驗，探索其在減輕貧困、改善公共健康、提升教育投入、刺激地方經濟、簡化行政流程以及作為應對技術性失業工具方面的潛力。

### 1.3 本研究的範圍、目的與重要性

本研究旨在對全球範圍內的 UBI 試驗進行全面評估，重點關注其在經濟影響、社會福利變革及實施挑戰方面的成效。研究範圍涵蓋已實施或正在進行的各類 UBI 試驗，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案例。本研究的目的是為潛在的政策制定者、學術界和廣大公眾提供一個多面向的參考框架，以便更全面地理解 UBI 的潛力與局限性，為未來的政策討論和決策提供基於實證的分析和建議。

## 2. 全球 UBI 試驗概覽

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已積極開展或正在探索 UBI 試驗，其設計、目標和規模各異，但普遍動機皆圍繞著應對貧困、收入不平等、潛在技術性失業、改善公民福祉（健康、教育）、簡化行政流程和刺激地方經濟。

- **芬蘭 UBI 試驗 (2017-2018)**：由芬蘭社會保險機構 (Kela) 執行，為期兩年。向 2000 名隨機選取的失業公民每月支付 560 歐元，旨在探討 UBI 對就業激勵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影響。
- **加拿大安大略省基本收入試驗 (2017-2018)**：原定為期三年，向約 4000 名低收入居民提供基本收入，旨在評估其在減輕貧困和改善健康、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效果，但因省政府換屆而提前終止。
- **肯亞 GiveDirectly UBI 項目 (2016-進行中)**：非營利組織 GiveDirectly 在肯亞多個農村地區實施了大規模、長期的無條件現金轉移試驗，部分項目長達 12 年，惠及約 29,500 人。旨在發展中國家背景下，評估現金轉移對貧困、健康、教育、經濟活動和性別平等的影響。
- **美國斯托克頓市經濟賦權試驗 (2019-2021)**：美國加州斯托克頓市啟動的兩年試驗，向 125 名低收入居民每月發放 500 美元，主要關注其對收入穩定性、就業、心理健康和家庭福祉的影響。
- **德國 Mein Grundeinkommen 項目 (2014-進行中)**：這是由私人資助的 UBI 項目，透過眾籌向參與者提供為期一年的基本收入，旨在研究 UBI 對幸福感、創造力、社會參與和壓力水平的影響。
- **荷蘭烏得勒支等城市試驗 (2017-2020)**：荷蘭的烏得勒支等城市進行小型 UBI 相關試驗，主要針對領取福利金的居民，測試不同條件約束下對參與者動機、行為和福祉的影響。
- **其他地區的探索**：
  - **蘇格蘭**：曾提出在格拉斯哥、愛丁堡和法夫地區開展 UBI 試點計畫，旨在評估其在減貧、改善健康和促進社區發展方面的潛力，但由於資金和立法障礙，進展緩慢。
  - **印度**：曾有零星的小規模試點和政策討論，例如在中央邦進行過實驗，旨在探索 UBI 在農村地區減貧和改善健康的效用，但大規模推廣面臨巨大的財政和行政挑戰。
  - **巴西**：巴西是少數將基本收入寫入憲法的國家，自 2004 年起即通過了《公民基本收入法》，目標是逐步實現全民基本收入。但由於財政限制，目前主要實施的是有條件的現金轉移計畫（如 Bolsa Família），而非嚴格意義上的無條件基本收入。

## 3. 核心案例分析與其他值得關注的試驗

### 3.1 深度剖析芬蘭 UBI 試驗

- **試驗設計與實施細節**：芬蘭試驗選取了 2000 名 25-58 歲的失業公民，在 2016 年 11 月領取失業福利金。試驗期間（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他們每月無條件獲得 560 歐元，無需報告收入或尋找

工作。設有175,000名條件相似的失業公民作為對照組。主要目的是測試UBI能否簡化社會保障系統、降低失業人口的官僚負擔，並鼓勵他們接受短期或兼職工作而不損失福利。

- **對就業率的影響分析：**芬蘭社會保險機構(Kela)2019年發布的初步結果顯示，接受UBI的參與者在試驗第二年(2018年)平均多工作了6天，但這種差異在統計學上不顯著。試驗對受試者的就業率影響有限，未能顯著增加就業天數。然而，研究發現UBI參與者更有可能成為企業家或自僱人士。其對就業影響不明顯的原因可能在於試驗規模過小、時間過短，且僅針對失業群體，以及芬蘭現有福利制度的複雜性。值得注意的是，「統計學上不顯著」並不等同於「毫無影響」，而可能意味著影響太小以至於無法排除隨機性、樣本量不足以捕捉微小影響，或效應被其他因素抵消。
- **對參與者健康與心理健康的影響：**芬蘭UBI試驗顯著改善了參與者的心理健康。受試者報告其壓力、憂鬱、悲傷和孤獨感顯著減少，對未來和自身財務狀況的信心增強。他們的心理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高於對照組，對社會制度的信任度也有所提高。對身體健康的直接影響不明顯，但心理健康的改善可能間接產生積極作用。
- **社會福利體系的互動與變化：**試驗的初衷之一是簡化複雜的福利系統，參與者確實表示在申領福利時所面臨的官僚負擔和不確定性有所減輕。然而，由於試驗範圍有限，未能實現大規模的福利制度改革。如何將UBI有效整合到現有複雜的福利系統中，同時避免重複支付或削弱其他福利項目，仍是一個挑戰。
- **面臨的挑戰與主要結論：**芬蘭試驗顯示UBI在改善受試者心理健康和減輕行政負擔方面有積極作用，但在顯著提升就業率方面的效果有限。這凸顯了UBI設計需要與現有福利系統深度整合的複雜性，以及大規模推廣所需面臨的財政與政治挑戰。
- **方法論限制：**芬蘭試驗的樣本量相對較小(2000名失業者)，持續時間僅兩年，難以評估長期行為變化。試驗僅針對失業群體，結果推廣至整體勞動人口的外部效度有限。此外，試驗期間芬蘭政府實施的其他失業福利政策改革可能對結果產生混淆影響。

### 3.2 深度剖析加拿大 UBI 試驗(安大略省的基本收入試驗)

- **試驗設計與實施細節：**安大略省基本收入試驗(OBIP)原定為期三年，招募了約4000名18至64歲的低收入居民，分佈在哈密爾頓、布蘭特福德、雷灣和林賽等選定區域。單身人士每年最高可獲得16,989加元，夫婦最高24,027加元，如果參與者有額外收入，基本收入將按50%的比例扣減。殘疾人士可額外獲得6000加元。另設有超過2000人的對照組。約70%的參與者在加入計畫時已受僱。該計畫被設計為安大略省傳統社會援助體系的替代方案。
- **對貧困率和收入不平等的影響：**試驗旨在通過提供達到低收入衡量指標(LIM)75%的收入來有效減輕貧困。加拿大議會預算官(PBO)根據OBIP模式進行的全國範圍內基本收入計畫模擬，估計可將加拿大貧困人口數量減少近一半(49.0%)。
- **對健康、教育、住房等社會福利指標的影響數據：**儘管試驗提前終止，獨立研究數據顯示，83%的受訪者表示心理健康有所改善，焦慮和抑鬱水平降低；74%報告參與更多體育活動，疲勞減輕；40.6%的失業參與者利用機會追求進一步的教育或培訓；46%的參與者報告住房條件有所改善，住房安全感增強；86%的受訪者飲食習慣有所改善，69%減少了食物不足的情況；60%更容易償還債務，75%的應急財務準備更充分，84%減少了對親友的依賴。
- **資金來源與試驗成本分析：**該試驗由安大略省政府預算資助，原計畫三年內耗資1.5億加元。
- **面臨的挑戰與主要結論：**最嚴重的挑戰是新上任的政府在試驗僅實施約18個月後就宣布提前終止，導致無法得出長期影響的明確結論，並引發了政治干預凌駕於科學研究之上的爭議，以及對

政府信任的下降和集體訴訟。然而，有限的獨立研究數據顯示，OBIP對參與者的身心健康、福祉、食物和住房安全以及財務穩定性產生了顯著的積極影響，並駁斥了基本收入會導致人們放棄工作的普遍擔憂。

- **方法論限制：**試驗因政治原因提前終止，導致數據不完整，無法評估長期影響。參與者流失率超過25%可能影響數據有效性。此外，該試驗的「負所得稅」模式與廣義UBI存在差異，其結果推廣性受限。

### 3.3 深度剖析肯亞 UBI 試驗 (GiveDirectly 項目)

- **試驗設計與實施細節（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背景下的考量）：** GiveDirectly在肯亞西部295個發展中村莊進行了大規模、長期的UBI項目。約29,500名居民被隨機分配到長期UBI組（12年）、短期UBI組（2年）、一次性大額轉移組和對照組。每位成年人每天約可獲得0.75美元（每月約22.50美元），透過M-Pesa行動貨幣服務數位發放。這些轉移是無條件的，沒有任何附加要求或限制，特別考慮了發展中國家缺乏完善福利體系的背景。
- **對當地經濟活動、貧困水平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UBI提高了人們的創業精神和收入，受益人將勞動時間從工資勞動轉移到非農業自營職業。家庭總收入、消費支出、資產持有和儲蓄均顯著增加。一次性大額轉移和長期UBI尤其能促進新企業的設立和企業淨收入的提升。該項目旨在幫助整個村莊擺脫貧困，對受益人和非受益人都帶來了收入和支出的增加，顯示出溢出效應。
- **對教育、食品安全和社區發展的影響：** 項目對教育產生了積極影響，包括提高入學率和兒童考試通過率。受益人的食品安全狀況得到了顯著改善，且並未導致資金用於購買「誘惑性商品」（如酒精、菸草）。受益人的心理健康狀況有所改善，家庭內部性別關係得到改善，親密伴侶暴力減少了三分之一，村莊內的不平等現象也有所減少。
- **資金來源、效率與可持續性：** 肯亞UBI項目是一項耗資3000萬美元的重大項目，資金主要來自Google、NBA Cares、USAID、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等企業和基金會的支持。GiveDirectly以其高效率而聞名，約90%的捐款直接轉移給了受益人，其餘10%用於覆蓋發放成本。UBI由於無需嚴格的資格審查和合規監控，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
- **面臨的挑戰與主要結論：** 挑戰包括研究結果在其他地區的通用性限制，以及政治動盪對項目啟動的影響。主要結論是GiveDirectly在肯亞的UBI項目有力證明了無條件現金轉移作為一種有效的扶貧工具的潛力，它賦予了受益人選擇和決策的權力，改善了他們的經濟福祉、心理健康和社會關係，並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和正面社會影響。研究還表明，一次性大額轉移和長期UBI的效果最為顯著。
- **方法論限制：** 試驗在發展中國家背景下進行，結果可能無法直接推廣至發達國家。儘管規模較大，但其資金來源依賴私人捐贈，大規模推廣至國家層面的可持續性存疑。此外，月度支付組的參與者皮質醇水平升高，可能反映儲蓄或投資困難帶來的壓力，這提示了其複雜性。

### 3.4 其他值得關注的 UBI 試驗簡要分析

- **美國斯托克頓 (Stockton) 市的試驗 (2019-2021):** 斯托克頓經濟賦權試驗 (SEED) 向125名低收入居民每月發放500美元的無條件現金。研究結果顯示，保證收入顯著降低了收入波動性，提高了接收者獲得全職工作的比例，並改善了心理健康狀況，焦慮和抑鬱水平降低。參與者主要將資金用於食物、水電費和汽車保養等必需品，未發現對全職就業的負面影響。
- **方法論限制：** 斯托克頓試驗的樣本量非常小（125人），持續時間較短（兩年），結果的普遍性有限。私人資助模式雖靈活，但難以複製到全國層面。研究人員也指出，有40%的資金轉入銀行

帳戶或提現，導致部分消費無法完全追蹤。

- **德國 Mein Grundeinkommen 項目 (2014-進行中):** 這是一個由私人資助的UBI項目，透過眾籌向中獎者發放每月1000歐元（一年），或在「基本收入試點項目」中向120-122名參與者發放每月1200歐元（三年）。研究發現，參與者的生活滿意度和心理健康顯著提升，勞動市場行為幾乎沒有改變，既沒有退出勞動市場，也沒有顯著減少工作時數。該項目表明基本收入改變的是人們「如何」工作，而非「是否」工作，並促進了社會參與度。
- **方法論限制：** Mein Grundeinkommen完全依賴自願參與和眾籌，這可能導致參與者本身就對UBI持較為積極的態度（自我選擇偏差），且其規模和代表性有限，結果推廣性不高。

#### 4. 跨案例比較與綜合評估

UBI試驗在全球多地進行，其設計理念和實施背景的差異，導致了結果的多元性，但同時也呈現出一些共同趨勢。

##### 4.1 經濟影響綜合分析

- **對就業率的影響：** 各試驗普遍駁斥了UBI會顯著降低工作意願的擔憂。芬蘭試驗對就業率的整體影響微乎其微，但一些參與者表示有信心接受薪資較低的工作或創業。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參與者許多人轉向了薪資更高、工作條件更好、更穩定的工作，並有部分失業者為了進修或培訓而離開勞動市場。肯亞GiveDirectly試驗表明UBI提高了行動能力和收入，受助者並未減少工作，反而投資於畜牧業和非農業自營企業。美國斯托克頓市的UBI試驗顯著提高了全職工作率，受助者利用額外資金和時間去面試薪資更高的全職工作。這些結果普遍表明UBI可能改變人們「如何」工作，而非「是否」工作，甚至有助於優化勞動參與。
- **對貧困率、收入不平等和消費行為的影響：** UBI的核心理念是透過保證的月收入使人們擺脫貧困，並提高財務穩定性，減少收入波動。加拿大議會預算官的模擬指出，全國範圍內實施基本收入可將加拿大貧困人口數量減少近一半。肯亞GiveDirectly項目顯著增加了家庭的資產、消費和糧食安全，幫助受助家庭度過經濟難關。美國斯托克頓市的參與者報告財務穩定性提高，收入波動減少。在消費行為上，各試驗（斯托克頓、肯亞、安大略省）均顯示UBI資金主要用於食物、住房、水電費等基本需求和必需品，極少用於菸酒等非必需品。肯亞試驗中家庭消費顯著增加，涵蓋食物、醫療、教育和社交活動等多種商品。
- **通脹壓力與市場反應：** 在現有的小規模UBI試驗中，尚未觀察到顯著的通脹壓力。然而，如果UBI大規模推行，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包括通貨膨脹和市場反應，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領域。大規模實施UBI可能通過需求側（增加消費需求）和供給側（可能影響勞動供給或生產成本）雙重影響通脹。若產能無法匹配增加的需求，物價有上漲風險。同時，UBI作為工資的補充，可能影響勞動市場的均衡工資水平。這需要精細的宏觀經濟模型來預測，並考慮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

##### 4.2 社會福利變革綜合分析

- **對健康、教育、社會凝聚力、犯罪率等方面的影響：**
  - **健康方面：** 所有試驗都報告了UBI對心理健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如壓力、焦慮、抑鬱和孤獨感的減少，以及生活滿意度、幸福感和尊嚴感的提升。安大略省和斯托克頓的參與者還報告了身體健康的改善（如增加體育活動、減少身體疼痛、更多地進行醫療檢查）。肯亞GiveDirectly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觀察到身體健康的適度改善。

- **教育方面：**UBI普遍賦予參與者追求教育和技能培訓的財務彈性和時間。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參與者有32%重返校園或提升技能。肯亞GiveDirectly的項目也對教育產生了積極影響，包括提高入學率。
- **社會凝聚力與社區關係：**UBI減輕財務壓力使得參與者有更多時間和資源投入到社交活動、社區參與和志願工作中。芬蘭的參與者對他人和公共機構的信任顯著加深。安大略省的參與者與親友共處時間更多，更頻繁地參與課外活動和志願服務。肯亞GiveDirectly試驗改善了家庭內部性別關係，減少了親密伴侶暴力。
- **對現有社會福利體系的影響與潛在的改革方向：**大多數試驗都表明UBI有潛力簡化現有的、往往官僚繁瑣且帶有污名化的福利系統。芬蘭的試驗數據可用於社會安全體系的改革，旨在簡化社會安全模式。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試驗旨在替代傳統社會援助體系。美國斯托克頓市的SEED計畫旨在補充而非取代現有的社會安全網，並設立了「無害基金」以避免參與者失去其他福利。肯亞的UBI則在發展中國家作為減輕極端貧困的工具。UBI的引入可能解決「福利懸崖效應」，即當福利金領取者收入增加時，其福利金被迅速削減，導致工作收入的邊際效益極低甚至為負的現象。UBI的無條件性和固定支付模式可以使個人在工作時不會立即失去所有福利，從而提供更大的工作激勵。然而，如果UBI取代了現有的專項福利（如殘疾人福利、住房補貼），特定弱勢群體可能會因UBI的「一刀切」性質而獲得不足的支援，因此需要審慎設計與整合，確保額外支持措施的保留。

#### 4.3 資金來源與可持續性

- **不同資助模式的探討：**芬蘭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UBI試驗主要由**政府預算**資助，其規模和存續受政府財政狀況和政治決策影響。肯亞GiveDirectly項目完全依賴**國際私人慈善捐款**，使其具有較高的研究穩定性。德國Mein Grundeinkommen項目則透過**眾籌**運作，展現了公民社會對UBI的支持和實驗意願。
- **長期實施的財政可行性評估：**大規模實施UBI面臨巨大的財政挑戰。加拿大議會預算官的報告指出，若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基本收入計畫，預計每年將花費聯邦政府850億加元，但搭配稅收改革，實際淨增聯邦財政預算可能在38億至50億加元之間。芬蘭政府未延長試驗，部分原因即為財政部對經費不足的考量。私人資助模式雖然靈活，但難以支撐全國性UBI的龐大開支。通貨膨脹也是一個重要顧慮。從財政角度，大規模UBI的可行性高度依賴於激進的稅收改革，例如引入更高額的增值稅、金融交易稅、碳稅、數字稅、資產稅或累進所得稅，同時可能需要削減現有低效的福利項目。這些改革必然會面臨巨大的政治阻力，並對不同收入階層產生不同的影響。

#### 4.4 政治可行性與公眾接受度

- **各國政策制定者和政黨對UBI的態度：**UBI在政治上仍存在兩極分化。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試驗因新政府上任後認為「成本過高」且與其「從福利轉向就業」的目標不符而提前終止，這清晰地反映了UBI計畫在政府層面推動時，極易受政治環境變化的影響。芬蘭政府儘管承認受試者福祉提升，但因更側重就業數據，最終未擴大試驗。然而，加拿大參議院近期仍有議員提出全民基本收入法案，顯示其在政治討論中仍具一席之地。
- **公眾輿論、支持與反對的聲音：**各試驗都提供了證據，表明UBI並未顯著導致受試者「變懶」或停止工作，反而普遍改善了受試者的心理健康、減少了壓力，並給予他們追求教育、創業或從事有意義活動的機會。這些正向結果有助於在社會層面建立對UBI的信任和支持，挑戰了傳統上對



貧困人口的迷思和對「不勞而獲」的擔憂。德國Mein Grundeinkommen透過實驗證明UBI增加創造力、減輕壓力且不影響工作，有助於改變公眾輿論。

## 5. 批判性觀點與爭議

UBI作為一項政策提案，旨在為所有公民提供定期且無條件的現金支付，引發了廣泛的辯論。儘管支持者認為UBI能有效減輕貧困和應對技術性失業，但批判者也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其可行性、公平性和潛在負面影響的嚴肅質疑。

- **對勞動意願和生產力的影響：**UBI最主要的批判之一是它可能削弱人們工作的動機，進而導致生產力下降和經濟停滯。批評者認為，如果個人無論是否工作都能獲得基本收入，他們可能會選擇減少工作時間，甚至完全退出勞動力市場。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一項研究指出，UBI可能導致生產力下降，人們工作時間減少，勞動力市場參與度降低，甚至失業時間延長。然而，也有觀點認為，UBI可以消除「福利懸崖」效應，鼓勵人們尋找工作。**實證反駁指出，許多試驗表明UBI並未導致大規模的勞動意願下降，反而可能提供創業、教育或尋求更好工作的機會。勞動市場專家如Guy Standing認為，UBI賦予「工作者」（worker，包含有償和無償勞動者）更多議價能力，減少「打工者」（labourer，被動接受低薪者）的比例，有助於提升勞動市場質量。**
- **潛在的道德風險：**UBI的批評者認為，它可能破壞勤奮和自力更生的原則，導致對國家產生「依賴文化」，甚至獎勵懶惰。這種觀點認為，無條件的收入會造成對政府的依賴，並可能模糊能夠工作和不能工作的人之間的區別。部分人擔心受益人可能會濫用資金（例如用於藥物或賭博）。加拿大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60%的加拿大人認為UBI會增加人們對國家的依賴並阻礙就業。**實證反駁顯示，多數UBI試驗的資金主要用於基本必需品，而非濫用。行為經濟學研究表明，貧困本身會導致認知負擔和短期決策，穩定的基本收入反而能減輕這種負擔，促進更理性的長期規劃。此外，對「依賴」的擔憂也應考慮到現有福利系統同樣可能產生依賴，且UBI更少污名化。**
- **大規模實施的財政負擔和可持續性問題：**UBI的實施成本是其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批評者估計，全面實施UBI可能佔國家GDP的5%至30%。如此龐大的資金需求將需要大幅增加稅收，可能對企業和高收入者造成負擔，潛在影響經濟增長和投資。在可持續性方面，UBI可能會排擠其他社會或環境計畫的資源，或加劇國家債務。通貨膨脹是一個重要顧慮，因為在商品和服務供應沒有相應增加的情況下，向經濟注入更多資金可能導致物價上漲，進而降低UBI的實際購買力。**財政保守派常強調UBI巨大的開支和對納稅人的負擔。然而，支持者反駁指出，如果UBI能有效削減現有複雜福利系統的行政成本，並因改善健康、教育、降低犯罪率而減少其他社會支出，其淨成本可能低於預期。精確的財政模型需考慮UBI對經濟增長、勞動參與、稅基擴大等多方面的動態影響。**
- **資源分配不均的可能性：**UBI向所有個人提供相同金額，無論其收入或需求如何，這被批評為一種低效的資源分配方式，因為它也向不需要經濟援助的富裕個體提供資金。批評者認為，這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創造一個依賴福利的「受惠者」階層。如果UBI取代現有的福利計畫，它可能無法有效地針對最脆弱的人群提供支援。此外，一些分析師擔心UBI可能使低薪和不穩定的工作常態化，或加劇住房不平等。**倫理學家和社會正義倡導者爭論UBI的「普遍性」是否能真正實現公平。一些人認為，更有效的方式應是針對性福利。然而，支持者反駁，普遍性消除了福利申請的污名化和行政障礙，能更廣泛地覆蓋隱性貧困。對於富人也受益的問題，可以透過稅收系統進行回收（如負所得稅模式）。對於使低薪工作常態化的擔憂，應結合最低工資政策來討論，以確保UBI不被雇主濫用。**

- **對現有 UBI 試驗方法論和結果解讀的質疑：** 現有的UBI試驗在方法論和結果解讀方面受到多方質疑：
  - **短期性與樣本限制：** 大多數試驗（如芬蘭的兩年試點、加拿大的提前終止試驗）持續時間較短，難以對全面UBI計畫的長期影響得出確切結論。這些試驗通常涉及特定群體，其結果無法推廣到整個國民或不同收入階層。
  - **外部效度與可推廣性：** 不同國家之間福利制度的差異限制了試驗結果的普遍適用性。短期試驗無法測試永久性UBI的激勵效果，因為人們在知道收入是暫時性的情況下，其行為可能會有所不同。
  - **資金機制未經檢驗：** 許多試驗並未處理國家層面實施UBI所需的大規模資金機制及其帶來的巨大稅收負擔。
  - **霍桑效應 ( Hawthorne Effect ) 或其他偏差：** 試驗參與者可能因知道自己正在被研究而改變行為，這可能導致結果失真。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會 ( NEF ) 分析了16個UBI計畫後得出結論，沒有證據表明任何形式的UBI能夠同時實現「可負擔、具包容性、足夠且可持續」的目標。**對這些方法論質疑的反駁通常強調，即使是小規模試驗也能提供寶貴的初步證據，幫理解行為模式。學術界普遍呼籲進行更大規模、更長期的隨機對照試驗(RCT)，並在設計中考慮到消除霍桑效應的措施。同時，批判者也應看到，雖然資金機制未在試驗中直接驗證，但許多經濟學家已提出多種可行的財政方案供討論，並非完全沒有解決之道。**
- **UBI 對勞動市場未來發展的深遠影響 ( 自動化、零工經濟 )：** 隨著自動化和人工智慧的發展，未來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結構性失業。UBI被視為應對這一挑戰的重要工具。它為失業者提供安全網，支持他們進行技能再培訓和轉型，或鼓勵他們參與非傳統的、創造性的或無償的勞動形式（如社區服務、藝術創作）。在零工經濟下，UBI可以為缺乏傳統福利保障的零工提供基本的收入穩定性。

## 6. 結論與政策啟示

全球普遍基本收入 ( UBI ) 試驗初步顯示出其在減輕貧困、改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方面的顯著潛力，同時對就業率的負面影響似乎低於許多人預期。芬蘭試驗明確指出UBI能有效改善受試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滿意度，並減少申領福利的官僚負擔。加拿大安大略省和肯亞GiveDirectly的試驗也證實了UBI在改善身心健康、食物和住房安全、財務穩定性以及促進經濟活動和創業方面的積極作用。**這些試驗結果有力挑戰了對UBI會導致「懶惰」或「浪費」的常見刻板印象，反而顯示UBI能賦予個人更大的自主性，使其投資於自身發展和社會參與，從而提升整體社會福祉。**

然而，要從這些初步的、往往是小規模和短期試驗的成功，推論至大規模、全國性UBI政策的普遍適用性與長期成效，仍需極為謹慎。研究結果普遍存在外部效度限制、樣本代表性不足、以及其他政策或外部因素混淆結果的可能性。現有試驗多為短期或特定群體，無法充分模擬全面推行UBI可能帶來的宏觀經濟與社會轉型。其長期和大規模實施的財政可行性、對整體宏觀經濟結構的影響，以及公眾接受度仍是需要深入探討的關鍵問題。批判性觀點提醒我們，需警惕UBI可能帶來勞動意願下降、財政負擔過重（需要激進稅收改革）、道德風險和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特別是在宏觀經濟層面，大規模UBI可能引發通脹壓力，其資金來源需要激進的稅收改革（如增值稅、碳稅、資產稅等），並可能對勞動力市場結構產生複雜影響。UBI與現有福利體系的整合也需精細設計，以避免對特定弱勢群體（如殘疾人士、單親家庭）造成損害，並確保能有效解決「福利懸崖效應」而非製造新的問題。**

基於本研究的發現，未來的政策制定者在考慮UBI時應採取審慎且多面向的策略：



1. **實施更大規模、更長期的試驗：**應鼓勵在國家或地區層面設計並推行更具代表性、持續時間更長的隨機對照試驗(RCT)，並確保試驗設計納入嚴格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評估指標，包括對非受益者的影響分析，以克服現有試驗的方法論局限性。
2. **精細化財政模型與資金機制設計：**必須投入資源開發更為精細的宏觀經濟模型，以評估不同UBI實施方案的財政可持續性，包括各種稅收改革（例如累進所得稅、消費稅、碳稅、數字稅、資產稅、金融交易稅）、現有福利系統整合以及潛在的通脹管理策略。這需要深思熟慮，以避免對經濟增長和財政平衡產生負面影響。
3. **UBI與現有福利體系的審慎整合：**UBI不應被視為完全替代現有福利的單一方案，而應探索其作為補充或優化現有社會安全網的潛力。應仔細評估UBI與失業救濟、住房補貼、殘疾人福利等專項福利的互動機制，確保特定弱勢群體不會因「一刀切」的普遍支付而失去所需的支持。
4. **推動配套政策以最大化效益：**在推動UBI時，應同時考慮配套政策，如技能再培訓計畫、可負擔住房、優質醫療服務和穩健的最低工資保障，以最大化UBI的正面效應（例如促進就業轉型、提升健康福祉）並緩解潛在風險（如薪資被壓低）。
5. **建立跨黨派共識與公眾溝通策略：**UBI是一項涉及社會結構深層變革的政策，需要建立廣泛的跨黨派共識和有效的公眾溝通策略。應正視並回應社會對UBI理念和實施挑戰（如「不勞而獲」的道德觀念、財政負擔）的擔憂，通過基於證據的公開辯論來提升UBI的政治可行性和公眾接受度，避免將UBI視為解決所有社會經濟問題的單一銀彈。

總體而言，普遍基本收入作為一項創新的社會政策工具，在當前社會經濟轉型期具有重要的探索價值。儘管初步試驗結果令人鼓舞，但其大規模實施仍需克服多重挑戰。未來的研究與政策實踐應持續以嚴謹的實證精神，在充分考量各國國情與權衡利弊的基礎上，逐步探索UBI的可行路徑。